

YIHAIRUQIANJI

艺海几潜记

陆文夫著



艺海入潜记

陆文夫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朱展程

艺海入潜记

陆文夫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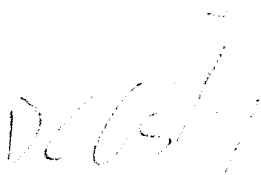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64,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册

书号：10078·3851 定价：2.00元



前 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作家们谈创作的丛书，也找到了我。我开始不敢答应，因为我也记不清楚到底谈过些什么，有几处对、几处错，几处已经过时，几处是胡言乱语。何镇邦同志十分热心，愿意为我编纂。他到处搜集材料，说我还谈得蛮多。我看了目录之后便有点不安，再谈下去便要变成口头文学家了，还得多写点作品才是。

我恳求读者诸君，对于我的创作谈不可全信，更不可当作创作入门。这倒不是说我对自己的谈话不负责任，而是说创作主要靠自己去摸索，他人的经验和见解也许只对他人的有用，对自己是不灵的。读读他人的创作谈只是了解某人的苦衷和经历，自己的路还是要靠自己走的。

很抱歉，我对文艺理论缺乏研究，有些观点也经常变，前后可能有自相矛盾之处，希望大家把它当成一种变化的痕迹。

陆文夫

一九八六年五月于苏州

目 录

前言	1
----------	---

第 一 辑

自传	3
微弱的光	9
却顾所来径	17
《小巷深处》的回忆	32
创作过程中的看、想、写	37
——同苏州大学学生谈创作	
写在《美食家》之后	45
砌墙与拆墙	48
——关于《围墙》的创作	
就八四、八五两年的近作同何镇邦的对话	52

第 二 辑

为读者想	67
过去、现在和未来	78
要有点新意	90
突破	98
——在江苏省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的发言	

人过中年话提高	118
无师而无不师	127
捕捉形象的能力	135
误会与巧合	144
漫话小说创作	154
对一九八一年“青春文学奖”获奖小说的技法分析	164
穷而后工	176
看得细、想得深、写得严	183

——在昆明市文学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技巧、主题、风格及其他	196
-------------------	-----

——在《滇池》、《青春》举办的改稿班上的讲话

造园林与造高楼	203
---------------	-----

——谈作品质量的提高

创作靠“两条腿”	208
----------------	-----

改革时代的文学	214
---------------	-----

——在《小说家》举办的北戴河笔会上的发言摘要

煎熬中的起飞	220
--------------	-----

第 三 辑

搭架子	227
-----------	-----

写社会	230
-----------	-----

同生活靠得更近点	235
----------------	-----

快乐的死亡	238
-------------	-----

文学创作的“长征”	240
-----------------	-----

艺术辩证法的运用(代后记)	何镇邦 242
---------------------	---------

第一輯

自 传

我于一九二八年阴历的闰二月初二，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叫作四圩的村子里。童年时期是跟着祖母在村子里长大的。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又跟着祖母迁到靖江县一个叫作夹港的地方，这地方是长江边上的一个水陆码头。当时，我的父亲在码头上的大通轮船公司工作，我的家便住在公司的旁边。所以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接触过很多人，对来往客商和三教九流都有些一知半解。大约是六七岁的时候便开始读书，那时候农村里还没有学校，读私塾，自己带着板凳桌子，到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面前上香点烛，叩头。塾师秦老夫子坐在神位的旁边，受我三拜，提笔给我取了个学名，叫作陆文夫。于是，我在世界上便有了个正式的代号，而且沿用至今，表示坐不改名，行不改姓。

我在秦老夫子的教导下，先读《百家姓》、《千字文》，后读《千家诗》、《论语》等等，可能我当时读得很快，记得每天要背两次书，背得出就算会了，再教新的。大约读了一年，私塾奉命改良，变成学校，秦老夫子变成了学校里的语文老师，开始读白话文，还有地理、历史，还上体育，学唱歌，比私塾里有趣得多。又是一年多，抗日战争开始，学校停办了，秦老夫子又重操旧业，在离我家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上开

馆。秦老夫子认为我是他得意的门生，说服了我的父亲，跟着他去当寄宿生。我又开始读圣贤书了，《史记》、《孟子》外加《古文观止》，还要吟诗作对什么的。其实都是乱弹琴，我直至今今天也不懂格律，只记得些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以及来鸿对去雁等等。

这一段的学习生活是十分寂寞的，所谓寄宿生（当地叫附学），实际只有两个人，加上秦老夫子是三个，白天大约有不到二十个蒙童，晚上便只有我们三个人。秦老夫子离妻别子，当然比我们更寂寞，便带头看小说。这就坏事了，你看我也看，看得比你还起劲。秦老夫子也很开明，他认为凡是印在书上的字都是圣贤传下来的，都可以看。看完了还要和我“讨论”，说某某小说如何好，谁比谁的本领高强等等，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文艺评论”。当时的社会上有一种职业，叫做“笔先生”，身背一个大竹箱，箱内有纸墨笔砚、课本等等，除此之外还夹带私货——小说。官货卖给学生，私货卖给先生。如果先生作成的交易多，私货便作为馈赠。只要不把小说书弄旧，下次贴几个钱还可以掉换，类似我们现在的租书业务。因此我们的小说来源可以不愁，记得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精忠岳传》、《封神榜》、《西游记》等。没有《红楼梦》，那是淫书。在这以前，因为我的祖母喜欢听故事，我识了几个字之后便开始买些唱本回来读给祖母听，那读和唱差不多，还有个调门。等我读了一些小说之后，便不唱了，讲，把小说的内容拼拼凑凑讲给祖母听，记不清楚的地方便来点儿合理想象，瞎编，这恐怕就是一种“创作”的开始。

跟着秦老夫子读了不到一年，我家又从夹港迁到泰兴

县一个叫作柏木桥的地方，离我家三里多路有个乡绅们办的学堂，我又去读了不到一年，后来便转到张家桥小学去读五年级。总之，我从小学到初中毕业，频频地换学校，最少的读不满一学期，最多的也不超过两年。从十岁开始便四处求学，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住些时候。那是抗日战争的社会动乱所造成的，这动乱培养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中学时期，读小说还是我的副业，找到什么便读什么，对什么都感到兴趣。只是兴趣太大了，副业成了正业，考试便成了问题，所以我在学校里的成绩是很不稳定的。下决心不读小说便可以名列前茅，抱住小说不放便名列三十几，没有变成倒数第一主要是靠点儿语文成绩，如果不是因为错别字太多的话，我的作文总是全班第一。因为我的用字多半是从唱本和小说中猜出来的，都有点儿似是而非。中学时期我很少读古典小说了，读了一些三十年代的新文艺作品以及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所谓社会言情小说。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从家乡的泰兴城来到了天堂的苏州，在苏高中读了三年。这三年之中除掉第一个学期之外，我的学习成绩是每况愈下，王小二过年，直到毕业时还有两门主课不及格，补考之后才勉强地把毕业证书领到手。其实我并没有在“天堂”里游荡，只是没有把《范氏大代数》等等放在心里。因为苏州是个文化古城，苏德路上旧书铺林立，各种书籍都比较容易弄到手，弄不到手也可以立在旧书铺里看，看得那老板或老板娘直翻白眼。这一段时期我读的书最多，中国的二三十年代老作家的作品，外国的从希腊神话到高尔基。这时候的读小说，除掉兴趣之外似乎有了

一点目的,要想寻找人生的道路和生活的目的。当时,国民党腐败反动,物价飞涨,学潮迭起,很多青年人都在思考着国家、民族与社会的前途,我也自命为“思考的一代”,所以便对《范氏大代数》不感兴趣。而把兴趣放在革命文艺、哲学和经济学方面。所谓哲学和经济学是很可怜的,弄不到这方面的书籍,只是知道世界上有一门叫作哲学的学问,是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我到图书馆去借这方面的书,好家伙,都是些落满了灰尘的硬面厚本,我硬着头皮看完了几大本,却不知所云,后来读到了《大众哲学》、《新经济学》、《新青年的新人生观》等等,自觉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居然还写过一篇谈存在决定意识的论文,寄给当时的某个进步的刊物,大概是写得实在不象话,他们没有登,要是登了的话,当年的兴趣很可能转向理论。

由于受了进步文艺和革命理论的影响,一九四八年高中毕业以后便进入了苏北解放区,在华中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一九四九年便渡江南下,又回到了苏州,在新华社苏州支社当采访员,后转入《苏州报》当记者,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工矿企业中采访了八年。我开始当记者时才二十一岁,出去采访时老同志都叫我小记者,关怀备至,十分爱惜,我工作得也十分努力,一心一意当好一个新闻记者,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各种问题。八年的记者生涯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锻炼,单就写文章而言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小时候的作文虽然也常得满分,但总是些《我的志愿》、《月夜的校园》等等,不去对社会、对生活发言。新闻记者则不同,除掉文字的准确、简练、生动之外,主要的是要学会从大的方面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是他主要的课题,

这对写小说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要写小说，实在是不敢想，我觉得写小说是很神圣的，是高不可攀的，居然能想出那么多的事来，说出那么多的话来，不容易！后来看到报纸上偶尔发表点配合任务的小说，看了以后大为惊奇，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和长篇通讯是差不多的，我也可以试试。我的采访笔记上、头脑里有很多素材，写新闻报道只用了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还有许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报道，很可惜，如果把它改头换面，凑油加酱地写出来，岂不很有意义！说干就干，夏天不睡午觉，关在一个斗室里，赤膊上阵，做出了一篇。当时各省还没有文艺刊物，上海有个《文艺月报》，便投寄了去。首投未中，原稿奉回。可喜的是那原稿中还夹了两张纸的退稿信，一张登记表，信中说我的稿件不用主要是内容不适于当时的需要（我写的是抓赌鬼），但认为我有较好的文学素养，懂得运用形象和文学的语言，是很能写的。其实我当时也不懂得什么叫形象和文学的语言，只是因为小说看得多了，不知不觉按照那种格局写来的。编辑是文学的权威，他说我懂，我好象也真的懂那么一点，他说我很能写，恐怕也是有根据的。何况还发给我一张登记表，发展我当《文艺月报》的通讯员，定期赠送《文艺月报》一份，不定期地寄一本《文艺通讯》，这可不是当耍的！我来劲儿了，继续地不睡午觉，晚上发完了新闻稿再种“自留地”，有时候写到天亮，第二天照样骑着自行车去采访，也不觉得累。我搞业余创作也不保密，领导和同志们都认为这是为人民多作贡献，不认为是什么个人主义，只有支持，没有打击。奋斗了几个月又做出了一篇，题为《荣誉》，这下子中了，《文艺月报》发表之后还组织了评论，还译成了

外文,引起了各个方面的注意。这下子不可收拾了,我把采访笔记里的材料都抖出来,急急忙忙地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集《荣誉》。所以这个小说集中的许多篇都带有新闻通讯的痕迹。《荣誉》带来了荣誉,我参加了华东作家协会,出席了全国第一次青年作者代表会。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了,便对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不满意,觉得那也算不了小说,小说不能作为概念的图解,必须写生活,写人,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感情。于是又写了《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等等,又听到了一片赞扬声。坏了,飘飘然不知所以,真的想当作家了。其时适逢江苏省文联成立创作组,当专业作家行动自由,时间充裕,我经不起此种诱惑,便欣然而去,从此便走上了文学之路,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天,一个开满鲜花的季节。谁知道文学之路是十分崎岖的,往后的二十年间两次批判,一次批斗,三次下放,做了七年半的车工和保全工,举家去农村落户九年。这些都是后话,众所周知,暂且不提,值得一提的倒是使我有可能向生活靠得更近点。

一九八二年四月

微弱的光

从某种角度来看，作家并不是一种美好的职业，因为他们总是不停地在煎熬自己。世界上的事情不可能按照作家的愿望来实现，人类的灵魂也不完全是由作家塑造的。可是他们总是不自量力，忧心忡忡，孜孜不倦，把自己的心血注进油盏里，燃烧，再燃烧，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辉。他们很少满足过，没有平静过，一种自我的骚扰贯穿了全部的生命线，烦恼大于安慰，感情的过剩有时可以造成危机。

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梦，却没有一个梦是想到要当作家的。这倒不是说我那时便知道作家不是什么美好的职业，相反，我认为能够写书的作家太了不起。因为我从七岁开始便读孔夫子的书，能够写书的孔夫子是圣人，连我的老师都要对着他的牌位叩头。不幸的是我从小便爱幻想，而幻想总是和文学有缘的，只有文学可以为一个孩子提供那么简便而又无穷的想象的天地。

想象也是需要诱发的，最先诱发我的是一条伟大的河流——长江。我出生在江苏省长江北岸的一个小村庄里，长江离开我家的大门不到二百米，沙沙的涛声每日催我醒来，伴我入睡。我每天都要坐在江堤上呆望，望着那些轮船和帆船从天边出现，又慢慢地消失在天的尽头。这就引起了我的

遐想：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想不出来，东望是水天一色，西望是水色一天，一片广漠的空白，遐想无所依附。

文学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来了，它使我的想象有了依附，有了发展。文学是一个五花八门的世界，开始有神仙鬼怪，接着便有爱情，有友谊，有欢乐，有眼泪，有卑鄙的勾当，有崇高的行为，有强盗的行径，有正义的事业。这一切都使我神魂颠倒，都想去经历经历。但是，文学所描绘的事物都不在我的家乡，也不在我读初中那个小县城里。最远的是在海外，最近的也在上海、南京和苏州。苏州我可以去，我的姨妈家在苏州做生意。

一九四四年的春夏之交，我穿着长衫，戴着礼帽，闯进苏州来了。苏州号称人间的天堂，她的美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觉得她象一部历史，一首古诗，是各种美妙故事的发源地，这些故事好象都曾经在哪部文学作品中读到过的。一个梦游天地的青年终于在大地上找到了落脚点，从此我便爱上了苏州，并在苏高中就读了三年。

三年之后我发现苏州是一个明媚而清澈的湖，污垢却都沉积在清水的下面。苏州有许多女人长得很漂亮，拉着她们走的黄包车夫却是一个个瘦骨伶仃，气喘嘘嘘的老头。天堂是建筑在地狱的上面。那些年正是国民党的统治腐败到极点的时候，苏州那美丽的外表再也掩盖不住人民的疾苦，我的兴趣和想象便因此而转向了社会，想为求得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而奋斗，让人人都能生活在天堂里。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升学，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去了，准备豁出命来打游击，不料游击还未打，国民党已经全面崩溃，我随军渡江又回到了苏州，在苏州报做新闻记者，前后做了

八年。那八年正是我们国家蒸蒸日上的时候，我热忱地为新社会唱赞歌，写新闻，写通讯，写社论。唱着唱着还觉得不过瘾，因为新闻和通讯都必须真实，好象嗓门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似的。忽然之间异想天开，何不做篇小说来试试呢，小说也写真实，但是可以虚构，可以把真实加以想象而求得艺术的完美。这时候我再也不把作家当圣人看待了，因为作家和记者之间只隔了一层板壁。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说干就动手。老实说，想写小说一方面是为了替新社会唱赞歌，一方面也有点弄着玩儿，想出点儿风头，没有想到这文学是个危险的游戏。

我的运气也真好，碰上了一个好编辑，没有经过多大曲折，居然陆续发表了《荣誉》、《小巷深处》几个作品，引起了一点轰动。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江苏省文联成立专业创作组，把江苏省在文学创作上稍有成就的人都搜罗进去，我也不当新闻记者了，到南京当专业作家去了。

真的要以作家为职业了，这事儿以前没有想过，现在得好好地研究研究：作家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对社会负有何种责任，应该怎么写，写些什么东西？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现在著名的作家高晓声、方之（已故）、艾煊、叶至诚、梅汝恺、陈椿年等人。我们几个人一研究，觉得文学不应该只是唱赞歌，要干预生活，创作方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不应该只有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写人，探索人生的道路，不应当写政策，写运动。同时认为过多的阶级斗争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这些话现在讲讲还可以，在二十八年前讲这些话简直是胆大包天！我们不仅讲，而且还准备创办一个同人刊物《探求者》，用艺术来实现我们的主